

二紀
反思
中國

考古學

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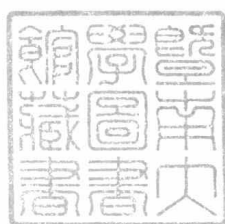
許倬雲 張忠培 主編

商務印書館

上冊

中國考古學的 跨世紀 反思

許倬雲
張忠培 主編



商務印書館

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上)

- 主 編 …… 張忠培 許倬雲
助理主編 …… 楊 晶 黎明釗
責任編輯 …… 陳玉嬋
封面設計 …… 吳雪雁
出 版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印 刷 ……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 ……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199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60 0 (上)
ISBN 962 07 5261 9 (下)
ISBN 962 07 5263 5 (套裝)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序

言

許倬雲

我是讀古代史的史學工作者，古史研究與考古學密不可分。因此，這一次中國考古學研討會中我也忝列籌備及組織人員之一，幫助張忠培先生完成這一次研討的任務，並且由研討之中獲益良多。為此，我個人願借本書出版的機會，向同人虔誠致謝。

會是開了，論文也已結集成書。作為史學工作者，我也有一些感想，在此向史學與考古學的同人提出，希望將來拋磚引玉能觸發進一步的思考與研討。學術工作本是一步接一步延續不斷的發展過程。這次會議無疑也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到這一階段的一次反思。正如長程行腳在中途駐足小憩，既有回顧又有前瞻，而且一定還會更往前行，攀登更高的山巔，渡過更廣闊的江河，前途是沒有終點的。這是研究工作者的宿命，我們的工作只是無窮的探索中一小段跋涉的旅程！

然而，每一個時代的研究，終究有其主題，亦即科學史研究者孔恩（Thomas Kuhn）所稱的典範（paradigm）。所謂典範，並非我們中國學童臨摹習字描紅本，其實毋寧是指大家協力探索的着眼點，而在探索時應用的方法學，也多少為了這主題而設計。在自然科學的園地，隔一段時期，累積的知識已不是原來的假設與理論足以解釋，研究者即不得不提出一些新假設、新問題，及用來探討驗證這些問題與假設的研究方法，於是一個研究主題轉換了另一個主題，一套想法與做法，各領風騷一個時期，即會由另一套想法與做法取而代之。

中國考古學在近代的發展也是如此。七十年前，科學的考古學在中國奠基，超越了過去古器物與古文字研究的範圍，從考古發掘，探索人類的過去。經過半個世紀的累積，中國考古學建立了一整套研究方法，尤其層位學與類型學方面，中國考古學有傲人的成就。另一方面，半個世紀來，中國考古學提出的問題，卻長期未有相應的擴大與深化。直到最近二十年，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區系類型的觀察角度，中國考古學終於突破了樊囿，有了廣闊的視野。蘇先生的突破，正是孔恩所說，設立

了新的研究主題，我們這一次考古學研討會上提出的論文及發言討論，這一新主題幾乎無時無刻不在主導同人思考的方向。作為一個半在門內、半在門外的參與者，我深切地感到喜悅與興奮，正如走入大花園的月洞門，眼前別有天地，有無限引人的景色。畢生有此種經驗，十分可貴！

蘇先生區系類型的理論當是動態的：一方面，一個文化無論範圍大小，內容豐儉，都不能靜止不變，文化內在的演變與外來的刺激，不斷疊合與變化的動力，促使文化經由衝突而整合，改變了文化的範圍及內容；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樣不斷的調整，任何單一文化不能自外於鄰近的其他文化，而出現進退、漲縮與分合。單從某一文化的角度看，這一文化既是內含許多因素的複合，又正在與鄰近文化互動，建構更大的文化體。這一過程不斷地互動與調整，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小到個人的創造與學習，大到建構全人類文化的龐大體系。因此，蘇先生的理論不僅對中國考古學有劃時代意義，也對一般史學工作者有提示作用，有助於分析與理解人類發展的歷史現象。

以我自己的經驗而言，在接觸蘇先生的理論以前，即從梁啟超先生〈中國歷史敘論〉一文中得到啟發，而提出中國歷史一步一步開展的想法。梁任公以為中國有過中原的中國、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及世界的中國，這幾個階段。愚見則以為，中原的中國又何嘗不是若干不同成分的整合？而“中國的中國”，其邊界界限又何嘗不是時時改變？另一方面，文化的內涵可以有不同的範疇，各範疇有相當的疊合，卻又未必有完全相同的邊界。前者之例：一個文化的成員、衣食住行的方式可以大致相似；例如，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有相當的一致性。後者之例：同一文化內不同成員之間，可以因其職業與訓練而有不同的思考方向及思考方法；例如，不同文化體中的一些專業人員，可能有共同的專業語言，而其同文化的成員，不在同一專業的人士未必使用同樣的語言。我在觀察中國歷史時，也是以同樣的觀察角度，驗證其他文化體系的發展與成長，則又深喜其有用。在拜讀蘇先生的著作後，既欽佩蘇先生的卓見，又竊幸自己從史學方面引伸的觀察角度，實與考古學所見可以相契。這一次在香港的研討會，對我自己的成長毋寧是重大的印證。

私心欣喜之餘，我建議考古學同人，中國考古學不僅可以發展蘇先生所說的中

國學派，而且中國考古學的思考範圍，絕不應受中國疆域之限。中國的行政版圖不斷變化，新石器時代哪有“中國”之存在？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內不受省區界線制約，外不受國界限固。我們在探討東北地區的考古文化時，不能不聯繫朝鮮半島及日本海兩岸的考古文化；作為思考的範圍，在研討北方地區考古文化時，不能不聯繫草原文化為思考範圍。同理，西南地區與中南半島及東南亞不能分開；由北至南，東部海濱地區的考古文化，不能與太平洋周邊大文化圈分開。凡此所謂聯繫域外的考古文化，我以為不僅是器物、遺址、類型的比較對勘，也意指族羣移動分合、文化交流，及環境改變之後各文化的調整與修改。循此線索，我們尚可在全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找到中國地區人類文化的定位，也可為全人類的文化史，勾畫到其在亞洲太平洋一帶的發展面貌。

我們研究的取向是觀察與探索文化演變的過程，已如上述。考古學在遺址與器物的後面，尋找那些文化的人類活動。睹物見人，從而重建當時人類羣體和個體的生活與思想。惟其有此目的，我們對於史料的性質，不僅注意其積極反映當時當地生活的價值，也須注意其相應的局限性。在實證史學興起時，史學工作者相信史料本身有客觀的真實性，於是有“史料即是史學”的口號。現在的史學工作者則大致認識到史料本身，既有相當主觀的成分，也有嚴重的不足處。文獻資料，由觀察者、到記錄者、到傳述者、到綜合編輯者……每一步都經過選擇、簡略、剪裁……諸種主觀的裁決與判斷，每一步都受那些處理者各自心態及現實環境的影響。到了史學家本人手裏，他又有其裁決與判斷的尺度，最後的綜合敘述更不免承受其自身觀點的制約。

考古資料也是一種史料，一般人的意見，以為仔細發掘的考古資料是客觀可靠的史料，其可信性比文獻史料為高。但是，我們也當警惕：考古資料也一樣經過上述的處理過程。以墓葬的隨葬品為例，從選取文物，到安排文物，到發掘者記錄出土情形，到整理者的分類編排，最後到撰寫報告者的敘述……每一步驟也經過不少層次主觀的制約。考古資料既是史料，遂也有不足之處。憑藉史料建構歷史，史學家必須戒慎恐懼，不敢有過分的自信。考古學家重建考古資料後面的人類生活及心態，也一樣必須持戒慎恐懼的態度，庶幾有“毋固、毋我、毋意、毋必”的四戒，減少一些失誤。因此，考古學誠然是一門科學，考古學家恰如史學家一樣，不能自

詭重建的人類文化面貌是不容質疑的鐵律。

秉持這樣的戒慎恐懼，庶幾在不斷追索人類文化發展記錄的研究工作上，考古學家與史學家並肩攜手，能從有限的窗口，窺見一幕又一幕古人締造文化的努力。我們的古史研究者當即是如此探索的又一次嘗試。

這次研討會承香港中文大學主辦，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資助，張忠培先生大力策劃，黎明釗先生及中大歷史系同人的勞累，香港考古界朋友的支持，及出席同人全心全意的投入，始有成功；又得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成書。凡此均為難得的機緣，我忝列發起人之一，目睹本書出版，十分感佩上述各單位及各位同人的心力。從籌備這次會議，以至此時撰寫序文，我對蘇秉琦先生的思想欽服甚深。這次研討會結束不久，蘇先生遽歸道山，我希望與會同人同意，將這本會議論文集紀念這位中國考古學的巨人。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於美國匹茲堡

目 錄

上 冊

序言	許倬雲	i
1. 中國考古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張忠培	1
2. 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杜正勝	17
3. 中國史前社會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臧振華	53
4. 泥河灣盆地舊石器考古研究的幾點新收穫	謝飛	73
5. 中國陶器起源階段及相關問題	朱延平	91
6. 湘北洞庭湖地區新石器文化序列的再研究	裴安平	113
7. 黑龍江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初步研究	李伊萍	155
8. 西山仰韶城址及相關問題研究	張玉石	175
9. 半山、馬廠彩陶發展譜系及分期	李水城	195
10. 珠江三角洲地區幾何印紋陶的出現和文化的發展	趙輝	229
11. 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種新工具——玉器	楊建芳	251

1. 中國考古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張忠培

故宮博物院、吉林大學考古系

二十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基本上是在熱戰和冷戰中度過的。在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人們終於爭來了可以憧憬更美好未來的和平與發展的局面。在此世紀轉換之際，我們這些從事考古學研究的人們，不時地出現了前瞻性思考，或禁不住要問：二十一世紀的考古學將會是怎樣的考古學？我們都不是預言家，未來的事情不好預測。不過，前瞻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於對往昔的回顧和對今日現實的審察之中。因此，為了思考中國考古學的未來，還得從這個學科的昨天和今天談起。限於篇幅，尤其是個人的能力，在檢討這一問題之前，我想作如下的說明：

1. 這裏將要討論的中國考古學，不包括香港和台灣兩地的中國考古學，也不含國外對中國考古學研究，是指中國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這是一個界定。

2. 同時，無論是作為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的援手學科，還是被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所滲透的學科，範圍都十分廣大，在一般情況下，本文均不涉及，這是第二個界定。

3. 再次，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年代下限，早已進入宋元，從秦漢到宋元並已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成果，而本文將要討論和涉及的問題，基本上限於先秦，且只作些鳥瞰，這是第三個界定。

在此三個界定的前提下，對所擬題目加以討論。

一、以往走過的路

關於這一問題，我在《中國考古學史的幾點認識》一文中，提出過如下的認識：

“觀察中國考古學產生以來至今的過程，可認為以下事件表述了中國考古學前進與發展的主流，它們是：1. 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發掘；2. 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崗三疊層；3. 1948年蘇秉琦發表的〈瓦鬲的研究〉（是1940年寫成的〈陝西寶雞鬥雞台所得瓦鬲的研究〉一文的摘要，刊《鬥雞台溝東區墓葬》）；4. 1959年夏鼐發表〈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考古》1959（4））；5. 1975年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問題〉學術講演（《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6. 1985年蘇秉琦發表〈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講演（《遼海文物學刊》創刊號，1986）。這樣，以往的中國考古學已走過了五個時期，今天正經歷着它的第六個階段。”^{〔1〕}

中國考古學的過去與現在，學者選擇研究方向的歧異，學者之間認識的差別，功夫的深淺，水平的高低以及學科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狀態，都是恒見的現象。我的上述意見，沒有涉及考古學史應涉及的這些問題，講的只是中國大陸考古學的主流，對學科具有導向意義的重要實踐，或對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的理論揭示，以及可作為考古學史分期標誌的重大科學事件。這六個階段，是中國大陸考古學對學科內在發展邏輯的揭示過程，也是學科承前啟後具有質變階段性意義的歷史演變過程。我對中國大陸考古學以往所走過道路的這些認識，是在1993年提出來的。在世紀之交的今天，中國大陸考古學的發展仍未出現新的質變。我自認為這些見解，尚合時宜。

在以往發表的一些文章中，曾討論這些作為考古學史分期標誌的重大科學事件的作用與意義，須說明的是：我只是從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建設的角度，來評估具有考古學史分期標誌的意義的那些重大科學事件，故未言及揭示后崗三疊層的殷墟發掘，和《瓦鬲的研究》的鬥雞台的發掘。這並非是忽視這兩項發掘的意義。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一方針指導下，並由他策劃的殷墟發掘，向世界展示出一個較為完整、燦爛的商代後期文明，奠定了殷商史研究

的基礎，同時把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及研究水平推進到當時世界的先進行列，引起了世人的注目。鬥雞台的發掘，確立了先周文化和西周考古學分期，揭開了探索先周文化研究的序幕，證實了周人和商人屬於不同的文化譜系。無論是從中國考古學的形成、早期發展和對以後的學術傳承及產生的影響，還是從對當時史學研究的推進及確立考古學在整個史學中的作用和地位來看，這兩項考古發掘工作，尤其是殷墟的發掘，衝破了時代的藩籬，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是仰韶村發掘所難以匹敵的。

大家知道，中國考古學者一貫認為：中國考古學是廣義的中國史學的一翼。那麼，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形成和發展，在這廣義的中國史學中起着甚麼作用？佔有怎樣的地位？它對狹義史學有甚麼作用和意義？這是我想在這裏討論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不僅涵蓋面較大，且是動態的，實在不易說清楚。我只能講些個人的認識，目的是拋磚引玉，起到引起討論的作用。

中國的傳統史學，是通過文字資料研究歷史的狹義史學。金石學只是這種史學的附庸。在上一世紀和本世紀之交，基於中國社會的變革和西方進步思想的傳入，傳統思想出現了近代化的趨勢。隨着新文化運動，尤其是“五四”運動的興起，加快了傳統史學變革的步伐，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當中國思想史上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奏，演變為科玄之爭的時候，中國古史領域湧現出了新的態勢：一是疑古風潮的興起；二是以仰韶村和周口店的發掘為標誌的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前者側重於“破”，後者側重於“立”，同時對傳統思想展開了勇猛的進攻，古史研究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疑古”廓清了經籍中的關於古代的荒謬傳說，使三皇五帝的神聖地位失去了依據，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古史研究起了進步的作用，然而卻不能建設起一座真實的古史大廈。同時，“疑古”往往疑過了頭，從疑經籍走到了疑人疑事，誠如杜正勝先生所說的“歷史研究本來只能就少數流傳下來的史料論證其史實，也就是據史料之‘有’而說‘有’的史事，不能因為史料不傳而斷定必無其事。”^②或如傅斯年所指出的“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餘也。據此燼餘，若干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多矣。以不知為不有，以或然為必然，既違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為術也。今日固當據可知者儘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若以或然為必然則自陷矣。”^③故史學隨同“疑古”步入了“迷茫”。

而考古學在中國的出現，則打破了以文獻為研究對象和附以金石學的狹義歷史學的治學傳統，開拓了它們不可問津的新史學領域，導致廣義史學的產生，並同“疑古”一道促進了史學的近代化。至遲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初，考古學在廣義的史學中業已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考古學者已作出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產生了一些新的學術認識。現摘要說明如下：

在鐵器時代，對一些城址進行了調查與勘探，並發掘了燕下都，搞清了東周城址的規模和某些城址的文化面貌。在青銅時代，通過殷墟、辛村衛國墓地和門雞台的發掘，揭示出較為完整、燦爛的商代後期文明，奠定了殷商史研究的基礎；認識到商、周屬於不同文化的譜系，確立了西周和先周的考古學文化分期。此外，還開始了商文化起源的探索，並認識到除商周青銅文明外，中國境內還存在諸如鄂爾多斯青銅器和辛店、寺窪、沙井，以及被後來區分出來的夏家店上、下層文化這類青銅器時代的遺存。在新石器時代及銅石並用時代，識別出仰韶、齊家、馬廠、良渚、龍山和昂昂溪為代表的文化遺存，展開了仰韶和龍山文化相互關係以及中國文化與文明的討論。在舊石器時代，除發現引起世界轟動的中國猿人及其遺存外，還在北京、東北、內蒙古和甘肅發現了舊石器中、晚期的墓葬及其他遺存，開始認識到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面貌區別於歐洲，以及中國猿人的一些體質特徵親近於蒙古人種的事實。所有這些發現及研究成果，基本上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至東周時期遺存的年代序列，顯示出中國古代文化與文明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和境外同時代的遺存相比均具有自身特徵，在某些方面又存在一些類似性，因而引起了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的普遍注目。“東西夷夏說”提出後，被三十年代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廣泛引證，從而使史學超出了“疑古”，擺脫了隨“疑古”俱來的“迷茫”。正是依靠考古學，史學才走上了重建古史的康莊大道。

二·走向未來的起點

中國考古學從未停滯不前。前進的道路儘管曲折、崎嶇、險峻，但總有人攀登。即使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中國考古學者仍推進了西南和西北地區的考古工作。1949年以後，尤其是1978年以來，中國考古學無論在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

方面，還是於學科的理論建設以及學者個人學術素養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完成了重建古史的基本任務。現就個人的理解，試作提要式的說明：

1. 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智人化石，已具備了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徵。例如鏟形門齒，且上可追溯到北京猿人，下與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相聯繫。舊石器文化可分為南、北兩大文化系統，北方又可分為兩個亞系統。在河北、湖南、江西及廣西已發現超萬年前的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存，儘管從文化上還不能確定它們和舊石器時代文化之間的直接傳承關係，但可推定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由中國境內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而來的。同時，據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文化之間存在的譜系差異來看，可以估定舊石器向新石器的文化轉化或演進，無疑是多元的。

2. 基本上搞清了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與編年，探明了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與遼河流域及燕山南北地區的諸考古學文化譜系。它們的源頭均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六千年。這些不同譜系的諸考古學文化，至遲從公元前五千年起就存在着文化、經濟等方面的交往。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交往愈益密切，以致於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為周秦實現政治統一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3. 關於生產技術與經濟，考古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下面述及的一些認識：

(1) 導致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的轉變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黃河流域及長江中下游地區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同時，發明了粟或稻作農業。據有關資料推知，這類農作物在當時人們的食品結構中仍只佔很小的比重；食物的基本來源，仍依靠漁獵和採集。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嫩江乃至遼河流域的較早甚至或晚至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居民，尚過着漁獵生活。無疑，可以推定他們的祖先是依靠漁獵經濟的提高，而實現從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轉化的。可見，種植農業的出現或農業革命，不是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轉化的唯一前提，同時即使在那些發明種植農業而由舊石器轉化為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居民經濟中，種植農業也並不處於重要地位。不過，應當指出的是，如果種植農業發明的意義，在發明之初尚不顯著，甚至還相當微小的話，那麼在以後的社會生活中，則愈益顯露出其重要地位了。

在世界上少數幾個農業起源中心之中，中國擁有粟作和稻作兩種。大約公元前

6000年左右，粟作農業已在居民的生活中佔據了相當的地位。長江中游的稻作農業，可追溯到公元前11000—12000年，公元前4000年的稻作遺迹已被考古學揭示出來。同時，公元前6000年在漢水上游及淮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及裴李崗文化遺址中，所發現的稻殼痕迹或稻粒印痕、炭化稻谷及稻米，說明早在此時稻作農業已開始自南向北傳播。

(2) 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使人們認識了磨光、穿孔、製石及治玉工藝的演變過程。直至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還普遍地使用打擊方法製作石器，儘管這時期的山頂洞人已發明了磨光、穿孔的技術，但只限於加工石質飾品而已。甚至在長江中游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的蛤蟆洞遺址中，與早期陶器伴存的仍是打製石器。可見，以磨製技術加工石質生產工具的出現，很可能晚於陶器的發明，至少長江中游是這樣。換言之，使用打製石器並發明了陶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這是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一個類型。同時，被學術界列入新石器時代的河南許昌靈井和陝西大荔沙苑遺址，則是既未見磨光石器、又無陶器的遺存，他們當是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另一種類型。看來無論是陶器，還是磨光石器，都難以認作是新石器時代到來的唯一標誌。

公元前第六千紀出現的切割石材的技術，經過不斷的改進，到了公元前四千紀晚期，線割石材技術和雙面鑽孔技術發展起來，整體拋光、棱角清晰、刃口鋒利及雙面鑽孔的石器廣泛流行。公元前三千紀後期，單面鑽孔替代了雙面鑽孔的技術。至此，製石技術發展到了頂峰。此後，似乎再難見到如此精緻加工的石器了。

公元前四千紀晚期，基於社會需要和製石工藝提供的技術，製玉工藝發展起來，形成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兩個玉文化中心。這時期的製玉，已運用了切削、陰刻浮雕、杆鑽鑽孔，以及旋轉機械工具琢磨和拋光技術。這樣複雜的技術，導致專門治玉的匠人從石匠中分化出來。

(3) 關於製陶技術的發明與演進。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是蛤蟆洞和仙人洞遺址中出土的陶器，經碳十四測定，兩地陶器的年代，均為公元前12000—13000年。蛤蟆洞陶器的陶胎分層，內外表皮均作糙面，顯然是以某種質地編織物做模或範，以貼塑法製作成型的。自此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各地居民均以貼塑法製

作陶器。到公元前6000年，長江及黃河流域出現了泥條盤築技術，遼河流域及廣大東北地區則發明了泥圈套接法製陶技術。至公元前5000年發明了陶輪，半坡文化居民在陶輪上用泥條盤築法製作陶器，然後輪旋加工口沿，使之造型規整。公元前第四千紀中期偏早，即西陰文化泉護遺址三期的居民，已用陶輪製作小型陶器了。從此，輪製陶器技術逐步推廣，到公元前三千紀初期前後，輪製製陶技術已相當普及了。順便說一下，這時期還出現了城，發明了水井和用於建築的土坯。應當指出的是，自此包括整個公元前第三千紀，自伊洛河以下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諸文化的輪製製陶技術的普及程度及輪製技術的發展水平，遠遠高於其他地區。公元前二千紀初期前後，吳越及百粵地區出現了用高嶺土製作的印紋硬陶，到了商代前期，吳越地區發明的原始瓷器，已在相當廣闊的範圍內流傳起來。伴隨着輪製製陶技術的普及，很可能出現了製陶的專業家族，至於製瓷專業匠人從製陶匠人中分離出來的時代，顯然較此要晚得多，具體年代尚待研究。

(4) 冶金技術的出現及其發展。這種比治玉、製陶顯然更複雜的工藝，已在公元前五千紀悄悄地出現了。到公元前第四千紀晚期，馬家窑文化、義井文化和紅山文化都掌握了製銅技術，採用了冶煉、範鑄和鍛打及戣磨技術製作銅器。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進入了銅石並用時代。這一時期的社會分工獲得了縱深發展，出現了專門從事製石、製陶、治玉、冶銅的家族或匠人。隨着聚落分化，出現了城或中心聚落，社會以家族為單位出現了貧富分化，巫師和掌握軍權的王成了社會的顯貴。總之，這是一個繼舊石器轉變新石器時代之後，伴隨着技術革命飛躍發展而來的社會大變革時代。爾後，歷經龍山時代的技術進步，至夏代進入青銅時代。儘管目前我們只知道齊家文化經歷了由純銅發展到青銅及四壩文化東灰山居民經歷了由砷銅到製作青銅的過程，但從夏時期不同譜系的諸考古學文化的銅製品在形制方面存在的差異來看，可以認為中國製銅工藝的起源及其初步發展當是多元的。在夏代諸考古學文化的製銅技術水平中，二里頭文化最為先進，其次是四壩文化的火燒溝居民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再次為齊家文化。四壩文化火燒溝居民的製銅業，在四壩文化乃至陝甘寧青地區，就其技術發展水平來說，是一孤島，它的存在很可能與中西文化交流有關。商代的青銅工藝顯然繼承於二里頭文化，至商代後期達到了鼎盛時期。周人承襲了商人的青銅工藝，到西周後期又掌握了冶鐵術。中國煉鐵技術的出

現，很可能緣於中西文化交流，但由於已掌握了高度發達的冶煉青銅技藝，使這一新技術較快地獲得了創造性的發展。至春秋晚期，開始用固體還原法生產塊煉鐵，幾乎同時發明了鑄鐵。戰國早期出現了生鐵脫炭農具，這一時期已以製作被認為是近代科學技術產物的球狀石墨鍛鑄鐵。鐵農具的出現，使五口之家的個體家庭可以獨立地經營農業，導致井田制被破壞，為實行郡縣制的中央集權的秦漢帝國的出現提供了前提。

(5) 家畜飼養與主營畜牧經濟居民出現的問題。中國古代居民飼養家畜始於何時？目前尚未搞清楚。最早被飼養的動物可能是豬、狗兩種，其次是雞。至公元前三千紀初期前後，水牛、黃牛、山羊和綿羊都成了飼養的動物。從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到龍山時代甚或晚至夏代才開始養馬。半坡文化時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居民的肉食品的主要來源，仍然來自漁獵業。到公元前第四千紀，家畜飼養業獲得了發展，此期的西陰文化居民肉食品的重要來源，似乎已可以依靠家畜飼養了。在公元前三千紀初期前後，甘青及東北地區的養羊業，增加了其在家畜飼養業中的比重。長城地帶居民的飼養業乃至畜牧業，經夏代及商代前期發展起來，到殷墟時期，沿長城地帶自東而西便出現了主營畜牧經濟、同時兼營農業的一些考古學文化。從這些考古學文化譜系觀之，可知其來源有二：一是由漁獵居民轉化而來，他們分佈於長城地帶的東部；另一是自農業居民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分佈在長城地帶西部。從這時期起，黃河流域的農業居民和長城地帶的畜牧居民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拼殺、戰爭和經濟、文化交流。張家口至大同地區，似乎具有三岔口地帶的戰略地位，是長城地帶東、西牧民之間，以及他們同黃河流域農民之間相互爭奪的要地，同時也是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正是這些活動，才較廣泛地溝通了歐亞大陸的文化交流。當然，東西文化經常性、大規模的交往，則是自西漢打通西域之後的事。

4. 基於考古學於最近十餘年來重視宗教遺存研究，使我們對宗教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人類社會的宗教觀念出現得很早，山頂洞人安葬死者時，在屍體上撒赤鐵礦石的行為，便是出於宗教信仰。近十年來發現的重要宗教遺存有：濮陽西水坡伴有蚌

殼鋪成的動物形象的墓葬，大地灣F411和表現行巫場面的地畫，牛河梁的“壇、廟、冢”，反山、瑤山的祭壇，和福臨堡的陶祖與石祖，橋村H4的羊肩胛卜骨，凌家灘M4的玉質卜卦器具等等。至遲公元前三千紀初期以前，中國考古學文化居民的宗教信仰就存在着一定的區別。例如，大汶口文化以及凌家灘M4為代表的文化使用龜算，橋村H4為代表的文化用骨卜，而良渚文化則以“黃琮禮地”。在以後的歷史過程中，由於文化交流，乃至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融合，經過人們的選擇，這些相異的考古學文化的宗教，便匯聚起來成為融合後的新考古學文化居民的共同信仰。換句話講，上述的宗教遺存所反映的宗教文化，便是中國宗教信仰的源頭之一，為後來宗教信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宗教信仰是科學不發達的產物，凡是科學佔領不到的領域，往往是宗教信仰的所在。在此前提下，宗教信仰是人類所在的自然和社會關係的輻射。自然界不僅不和諧，而且是不平等的。自然災害威脅着植物、動物及人類的安全，動、植物界本身亦存在着食物鏈和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因而反映和認識自然界關係的宗教信仰，也就是反映一個不平等的世界。所以，即使在平等社會裏所產生的宗教信仰的世界也是不平等的。它創造了超出自然和人類自身，而又受到人類崇拜和侍奉的神。隨着人們的神觀念的發展，導致神權的產生，以及對溝通人、神的半人半神的巫師的崇拜。前面提到的公元前5000年濮陽西水坡有蚌塑動物和殉人的巫師墓葬，表明在遠離王權出現之前的母權制社會的宗教信仰的世界，就已存在神權和崇拜巫師。這在客觀上為以後王權的產生，提供了思想環境。歷史的發展說明，那些最初為實現權力統治的代表人物，便是從傳統思想中請出了神權，加以宣揚、擴充，演出政教合一和王權神授這類魔術，以實踐他們的權力。

馮友蘭先生曾說過：“每個大宗教就是一種哲學加上一定的上層建築，包括迷信、教條、儀式和組織。這就是我所說的宗教。”^④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道教出現前，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宗教。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是有宗教的，這就是起源很早而流傳頗久的、以敬天祭祖為中心的泛神教。崇拜、神化祖先與祭祖，無疑是社會和宗教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現象。母權制時代崇拜女性祖先，父權制時代的紅山文化居民祀奉女神，說明當時尚未創造出與現實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男神的同時，也反映處於母權制時代的紅山文化先民已有崇拜女祖的宗教信仰。前面述及的